

# 世界戰略格局之未來 ——書目評論

## 明居正\*

1. Samvel Huntington, (沙繆爾·杭丁頓), “美國——衰落或復興？”原載 Foreign Affairs, (外交事務) (February 1989) pp. , 譯文見王保存, 陳景彪譯, 《世界強權的興衰——公元 1500~2000 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78 年 6 月)附錄, pp.421—447.
2. Charles Krauthammer (查爾斯·克洛泰默), The Unipolar Moment, (一元體系之時刻) Foreign Affairs, (外交事務) (Vol.70, No.1, 1991), pp.23—33.
3. Immanuel Wallerstein, (伊曼紐爾·華勒斯坦),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中程發展”, 聯合報, (78 年 1 月 1 日)特刊。
4. 柯志明,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與社會主義：伊曼紐·華勒斯坦訪問錄”, 知識份子季刊, 1986 年夏季號, 第 94—103 頁。
5. 保羅·甘迺迪 (Paul Kennedy), 《世界強權的興衰——公元 1500~2000 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 王保存、陳景彪譯, (78 年 6 月), 第八章, “走向二十一世紀”, pp.265—419.
6. Richard Nixon, (理查·尼克森), “Remarks to Midwestern News Media Executives Attending a Briefing on Domestic policy in Kansas City, Missouri, July 6, 1971 (論國內政策——對中西部傳播界之演講), 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1971》(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C.) 1972, pp.802—813

---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7. William Pfaff (威廉·菲夫), “Redefining World Power, (世界強權之再界定), Foreign Affairs, (外交事務) (70:1,1991) pp.34~48.
8. Earl Ravenal, (厄爾·瑞文諾), “The Case for Adjustment,” (調整的時刻), Foreign Policy, (外交政策) No. 81, (Winter 1990~1991) pp.3~19.

對於關心國際政治的學者或政治家而言，世界的戰略格局永遠是一個令人著迷的題目。早在希臘時代，休西底德斯 (Thucydides) 就以二元對抗的模式去描繪發生於雅典及斯巴達之間的培洛蓬尼西戰爭 (The Peloponnesian War)。在愛德華·佛斯·克力克 (Edward Vose Gulick) 眼中，十九世紀的歐洲就是古典多元權力均衡模型的最佳代表。亨利·季辛吉 (Henry Kissinger) 更進而指出，這種權力均衡的國際結構為歐洲社會保障了一百年的和平。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美國在雅爾達會議中的失算及俄國在東歐的擴張，一個二元對抗的國際結構於焉形成。四十多年來，美國及蘇聯二個超強，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華沙公約組織的支持下，除了進行意識形態的對抗及核武競賽外，還插手甚或製造世界各地的政治動亂，以期能將己方的影響力再向前推進一分。然而，四十多年的對抗卻使得兩大強國的國力受到極大的影響。就較為明顯的事例而論，美國自 1960 年代中期捲入越戰，十年之後，財政大感拮据，物價騰貴，加以石油危機的衝擊，致令經濟一度陷入不景氣。無獨有偶地，蘇聯在 1978 年底入侵阿富汗，至 1980 年代中期，亦不堪財政負累而不得不思退出。

兩個大國固然皆因長期對抗而受損，但是對蘇聯的衝擊似乎遠遠超過美國。1985 年，戈巴契夫上台後極力推動改革，企圖重建其國民經濟，以維持蘇聯的大國地位。不料戈氏的改革引發了東歐諸國的改革，竟一舉沖垮了維持四十年的共產集團。在國際政治中，諸元對抗，若其中一元因故不保，則國際結構勢必要發生變化，1989 年的國際局勢正是面臨這種狀況。正如本文起首處所指出，國際戰略格局的變化是一個令人關切的課題。早在 1970 年代初期已有人在探討變化的可能性，在 1989 年共產集團崩解後，這方面的研究即如雨後春筍般地大量出現。但是，究竟未來的世界會呈現出一種什麼樣的面貌，在學界乃至政界似乎存在著極大的分歧。因此，本文選擇了上開八份作品，透過整理，比較並分析他們的觀點，希望能對這個人人關心的問題得到更進一步的了解。

從國際政治史中，我們知道，在國際體系中存在著多少個主要行為者

始終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因為他們的數目不但決定了體系的性質，也決定了行爲者的互動模式。因此，當四十年來的二元體系發生鬆動時，人們首先關切的，就是未來的世界究竟是一個幾“元”的世界。若將現有的各種說法加以整理，對未來世界結構之描繪大致上可以區分為四種看法：一元、二元、多元及普遍不結盟狀態。主張未來的國際情勢將是一元世界者，包括杭丁頓（Huntington）及克洛泰默（Krauthammer）；認為未來有可能會發展成為另一個不同的二元體系者，厥為華勒斯坦（Wallerstein）；學界及政界中有相當一批人傾向於認為未來會是一個多元的結構。在本文中，我們選擇了甘迺迪（Kennedy），尼克森（Nixon）及菲夫（Pfaff）的觀點予以評介；最後，瑞文諾（Ravenal）獨排衆議，指出國際局勢未來會出現一種普遍不結盟（general unalignment）的狀態，而非存在著相互對抗的各“元”。

## 第一節 多元論者之看法與分歧

很顯然地，他們之間的歧見相當大，我們必須做更進一步的分析。

在本文所要討論的四派中，最早出現的應屬多元論。有趣的是，廿年前提倡多元論最力的不是別人，就是當時美國的總統尼克森與他的首席外交智囊季辛吉，尼克森與季辛吉二人固然都主張為美國利益計，最好能將一個美俄對抗的二元世界轉變成一個多元的世界，但是，二人之間仍有所分歧，季原則上肯定多元主義對國際和平保障較大，但在其 *White House Years*（白宮歲月）一書中另作了理論性的描述，（如第 69、115 頁）就具體政策而言，他只將多元主義落實至美、俄、中共之三角關係上。相對而言，尼走得較遠，他提出包含美、俄、中共、日本及西歐在內之五極多元論。故本文以討論尼克森之看法為主。

尼克森認為，在未來五至十五年內，世界上會出現前述五個經濟強權，或權力中心，甚或超強。美國當然廁身其間。英國將來會加入共同市場，且歐洲必然會採取共同的作為（*they certainly will [act together]*）<sup>①</sup>，而最終成為國際舞台上的新角色。日本的經濟實力已經很强，若以鋼的年產量來作估計的指標，則兩年後，日本將超過美國，因此，將來歐洲和日本都會成為強勁的經濟競爭者<sup>②</sup>。

他接著指出，蘇聯會繼續作為美國一個強勁、强大且具侵略性的競爭

①Richard Nixon, op. cit., p.804.

②ibid, pp.804~805.

者。至於中共，在尼克森的眼中，則有極大的潛力成為第五個經濟的強權。其理由則是因為中國人有創意、有生產力，而且能幹。令人多少覺得好笑的是，他是以在香港、台灣、新加坡、曼谷和馬尼拉的中國人的表現來論證中國大陸未來可能達到的成就③。

因此進一步來看，尼克森對未來世界會由二元結構轉變為五元結構，其立論的基礎並不紮實。他並不是將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的可能發展做過詳細評估後才得到這個結論。相反的，他是出於現實政治的需求才去進行此多元理論的“建構”。這個政治現實，不消說，就是美蘇二元對抗對於美國所產生的壓力。所以，與其說他對未來世界的看法是多元的，倒不如說他希望未來世界是一個多元平衡的體系。而且當這種結構成為美國外交政策追求的目標時，它就帶有規範性（normative）而不純然是學術上的預測（prediction）了。

最後，尼克森雖然提出了五元世界的構想，亦表示那會是一個比美蘇二元對抗要更穩定且和平的體系。但是，即使就政策面而言，他並未說明我們的世界如何會由二元走上五元，或者，我們應當採取什麼作為去實現這個目標。

尼克森預言上述情形最多在十五年內，亦即，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就會出現。可是，這個五元的世界體系——即使只限於經濟的部份——在二十年後仍未出現。因此，綜合以上的原因，我們可以說尼克森對於未來的五元世界帶有濃厚的空想性。

不過，這種空想性質的五元世界觀在十六年後卻出現了一個有力的回響。保羅·甘迺迪，一位耶魯大學的講座教授，在一九八七年推出了他的鉅作，《世界強權的興衰》。他以廣闊的視野及極豐富的材料對過去五百年來世界強權的興起和衰落作了全面的分析。他認為：

一流國家在世界事務中的相對地位總是不斷變化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國國力的增長速度不同；二是技術突破和組織形式的變革，可使一國比另一國得到更大的優勢。……一些國家的生產力一旦得到提高，便能比較容易在平時承受大規模擴舉備戰的負擔，戰時保持和供養龐大的陸軍和艦隊……

自十六世紀西歐進步以來，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和目前的美國等，一流強國的興衰史表明，在國家的生產力和取得收入的能力與軍事力量之間，從長期看，有一種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關係④。

③RN, ibid., pp.805~806

④保羅·甘迺迪，前引書，第8—9頁。

根據同樣的標準，甘迺迪指出，當人類邁入二十一世紀時，全世界有五個國家有資格成為未來的大國。第一個是中國大陸，甘迺迪對其所處地位的描述是“左右逢源”。因為即使大陸在軍事及經濟上有明顯的缺點，但是，它“在過去六到八年的改革和自我完善是舉世矚目的”，此外，他對中國大陸的國力作了如下的觀察：

自一九五二年以來，中國（大陸）的工業和農業年增長率分別為 10% 和 3% 左右，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率為 5—6%

…

對於中國（大陸）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衆多的大國來說，這個增長速度是令人難忘的，而且會使它很快轉變為一個相當規模的經濟大國⑤。

第二個國家是日本，它所提到的評語是“進退難谷”。甘對日本經濟的看法為流行的意見並無不同，他亦同意到了廿一世紀時，日本會成為「頭號」經濟強國，而且在電腦、機器人、電傳通訊、小汽車、卡車、船舶、生物科技、航空、航尺乃至國際金融，都處在一個世界領先的地位。但是，他同時也看見日本因此而面臨的困境：第一，日本的經濟擴張鄰近各國擔心是否將被吸入一更詭譎的「大東西共榮圈」，因此採取了一種警惕或保護性的政策；第二，由於內部及外在的壓力，日本無法走上老式的帝國主義路線去大規模地擴充軍備或攫取領土。因此，如果日本不大量增加軍備開支，它會受到批評；但是如果大量增加軍費，它又會受到譴責⑥。

第三個有潛力的地區是西歐，甘迺迪的看法是“有得有失”。就西歐各國的經濟實力、工業及科技，和軍事力量而言，他們都有資格在未來的國際舞台上一顯身手。但是，

如果歐洲共同體能夠真正團結一致地行動，它很可能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不管是軍事方面的，還是政治方面的。反之，如果人的不團結本性導致出現一種不利的結局，則歐洲衰落的趨勢就一定會繼續下去⑦。

甘迺迪認為第四個有潛力的國家是“矛盾重重”的蘇聯。毫無疑問的，就軍事力量而論，俄國是現今世界兩個大國之一。但是，若以前引的標準來評估，則其經濟結構將會變成阻止它成為未來大國的主要因素。因為它

⑤保羅·甘迺迪，前引書，第 285 頁。

⑥保羅·甘迺迪，前引書，第 314—315 頁。

⑦保羅·甘迺迪，前引書，第 344 頁。

的農業生產及工業生產的安排並未發生應有的效果，而且俄國不太可能像中共一樣進行大規模的改革。所以，當下個世紀來臨時，在世界各經濟大國中，它可能退居第四位或第五位。甘對俄國的未來作了如下的評斷：

即使莫斯科有一個積極進取的政府，它也不可能為發展經濟而放棄「科學社會主義」，更不可能為減輕負擔而大量削減國防開支。因此，蘇聯擺脫其目前困境的希望不容樂觀。蘇聯如果沒有龐大的軍事力量，在世界上就無足輕重；而有了龐大的軍事力量，蘇聯既使他人感到不安全，也妨礙了自己的經濟發展。這其實使蘇聯進退維谷<sup>⑧</sup>。

最後一個榜上有名的國家當然是美國。甘迺迪對它所作的評語是“相對衰落”，十分耐人尋味。就目前來看，美國在經濟上及軍事上都仍是「天下無匹」。但是，正如歷史上曾經叱咤風雲的任何霸主一樣，它必須面臨兩大考驗。通過考驗，它的霸權地位得以維持；不通過，它就會被他國取而代之。這兩大考驗為：第一，它能否在所需履行的戰略防衛義務及所估計的國防需求間保持均衡；第二，在全世界的持續性經濟生產競爭中，它能否在相對的衰落中保持其科技實力及經濟基礎<sup>⑨</sup>。

經過詳細的分析，甘迺迪對美國的未來並不樂觀：

因為昔日的「頭號」強國都面臨著共同的困境，這就是：儘管他們的相對經濟實力都在下降，但對其地位日益增多的挑戰，卻又迫使他們拿出越來越多的人力和財力投入軍事領域，從而擠掉了生產性投資；隨著時間的流逝，還將導致低增長和重賦稅的螺旋下降，加深國內對重點開支項目的分歧，削弱其承擔防衛負擔的能力……因此，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講，對美國能否保持其現有的地位，這一引起公眾日益廣泛爭論的問題的唯一回答，只能是否定的<sup>⑩</sup>。

若將尼克森與甘迺迪的五元論作一比較的話，毫無疑問地，後者比前者要來得更為紮實、縝密、更具學術性，因而更具說服力。除此而外，二者之間尚有一極大的分別：尼克森斷言上述五國必然會興起成為大國。但是甘迺迪並未作如此肯定的論斷，他只是指出最有潛力的五個國家而已。

甘迺迪教授與他人的論爭我們將在後文恰當時機再提出討論，現在先

<sup>⑧</sup>保羅·甘迺迪，前引書，第380頁。

<sup>⑨</sup>保羅·甘迺迪，前引書，第381頁。

<sup>⑩</sup>同上，第409頁。

來檢視其此部份理論的內在邏輯。第一，在五個潛在大國中，中國大陸是目前情況最差的國家，但是甘迺迪的評價卻為最高。他當然指出大陸在各方面仍有極大的弱點，不過，他似乎並未認真看待這些弱點。綜觀甘之論證，中國大陸之所以會“左右逢源”似來自二個原因：一，大陸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正在大力進行改革，而且在各方面都取得極大的成效，看來這種趨勢將會持續下去。二，從長遠來看，甘認為，中共終是代表一種政治及戰略力量，美、蘇二強無法忽視，而中共始終可以獨立自主且“左右逢源”。於此，我們必須記得，甘迺迪這本書出版於一九八七年——或者完稿於一九八六年。當時世界各國都驚訝於中共改革的幅度，而且改革所遭遇的問題尚未完全為外界所認識。是故，人們對其評價普遍偏高。隨著時間的推移及外界對改革內情的掌握，才開始對改革採取了較謹慎的看法<sup>⑪</sup>。

今日看來，即使撇開慘絕人寰的「六四事件」不說，中共的改革已陷入一個進退兩難的局面，經濟發展的規律催迫改革向前，但是改革帶來的經濟、社會變遷及由此而生的政治需求又使得大權在握的中共領導人踟躕不前。因此，中國大陸未來發展的形勢實未能如甘迺迪所預言地樂觀。

甘迺迪理論的第二個缺陷與前一個息息相關。前曾提及，他認為蘇聯矛盾重重，最主要的就是因為經濟結構不良、國防支出太高而且不可能進行像中共式的改革。若就經濟結構而言，中共與蘇聯是極其相似的。甘認為同樣的經濟結構不良的因素會對二者產生不同的效果就是因為中共敢大刀闊斧的改革而蘇聯不敢。於此，我們可以指出甘迺迪的二個不足之處。首先，他對中共改革的評價偏高。其次，他對蘇聯不敢進行改革的論斷完全錯誤<sup>⑫</sup>。甘的第二個錯誤並不罕見，因為在學界普遍存在一種高估俄國人堅持其意識形態純潔性的看法。所以，當戈巴契夫最初提出“新思維”時，西方世界大率抱持十分懷疑的態度。直至蘇聯及東歐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時，世人的看法才漸漸轉變。

不過，持平而論，甘迺迪教授的理論仍雖有其缺點，但是他對強國興衰原因的分析乃至對未來世界的看法仍然是十分具有啟發性的。

第三位主張多元論的是威廉·菲夫。他在一九九一年的《外交事務季刊》上發表了“世界強權之再界定”，他認為在共產集團瓦解後，世界並

<sup>⑪</sup>例如 CHU-CHENG MING, *The Reformer's Dilemma: Politic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81-1985*,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1986, PETER MOODY, JR., *Chinese Politics After Mao*, ( Praeger : 1983 )

<sup>⑫</sup>保羅·甘迺迪此處之論點參見前引書，第380頁。

非形成一個獨強的格局，而是成為一個沒有超強的時代。因為每一個國家，不論大小、強弱，都具有易毀性（vulnerability）。因此，現在在我們眼前的就是美國、日本及西歐三個經濟強權，至為未來世界的格局究竟會成為什麼形式則有賴下列三個因素：第一，蘇聯未來的變化，第二，西歐——尤其是德國——未來的發展，及第三，美國自身的經濟發展及外交政策取向<sup>⑬</sup>。

菲夫的論證並不繁複。與尼克森及甘迺迪相比，他的看法有其不同之處。第一，他不像尼克森那麼主觀地認定有那幾個國家必然會興起；第二，他避開了甘迺迪對於中共的樂觀的評價，第三，他不是五元論者，充其量，他只是經濟三元論者，中共及蘇聯在目前都已被他自強國名單上刪除了。另一方面，由於篇幅較短，論證不夠細密，所以菲夫對未來世界的預測力自然比較弱，留下了太大的想像空間。

## 第二節 普遍不結盟論者之看法

與菲夫的看法有類似之處者則為厄爾·瑞文諾（Earl Ravenal）的普遍不結盟論。瑞文諾亦認為，國際政治中，超強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因為兩強共治（Condominium）的局面並未形成，整個國際結構由於美蘇走上了相互解脫（disengagement）的道路而變得愈來愈分解及權力地區化（fragment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of power）<sup>⑭</sup>。

因此，瑞文諾認為，在未來的十五至三十年內，世界舞台上會湧現出十多個國家，各為其區域內的霸權或對抗性霸權。第一級的國家包括中國大陸、日本、美國及蘇聯。第二級的是一批新興的區域性強國，如巴西、印度、印尼、伊朗、及尼日利亞。第三部份是一些有潛力的挑戰者：埃及、德國、南非及越南。第四批是對抗性的霸權：阿根廷、法國、以色列及巴基斯坦。最後，他還列舉了一些不無希望的國家：澳大利亞、孟加拉、英國、加拿大、伊拉克、墨西哥、沙烏地阿拉伯、南韓、瑞典、敘利亞及南斯拉夫。瑞文諾指出，這份名單並非一成不變，但是整個國際結構演變的趨勢卻是如此<sup>⑮</sup>。

由於瑞文諾對於各國未來國力估計的方法尚未公諸於世<sup>⑯</sup>，因此，目

<sup>⑬</sup>威廉·菲夫，前引文，第39~46頁。

<sup>⑭</sup>厄爾·瑞文諾，前引文，第6頁。

<sup>⑮</sup>厄爾·瑞文諾，前引文，第13頁。

<sup>⑯</sup>Earl Ravenal, *Beyond the Balance of Power: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Order*,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Jorthcoming), 來源見前註，第13頁。

前尚無法就其理論作出完整的討論，我們只能就此短文與其他的作品作一初步的比較分析。第一，瑞文諾對於未來世界政治的結構比一般的多元論者更多元，他稱之為“普遍不結盟”狀態 (general unalignment)，亦即，強國的數目——尤其是地區性的——會大幅增加，地區的權力結構會更多樣化，及核子武器的擴散程度會提高。第二，前引的強國清單顯示，瑞文諾未將西歐視為一個整體。西歐的三個主要國家，德國、法國及英國，被他打散並列入不同的範疇中。此外，他更表示，西歐在 1992 年即使變成單一市場後，其至政治層面的整合將會遭遇困難<sup>⑯</sup>，第三，對中國大陸的評價亦明顯地偏高。最後，由於美國國力的相對衰落及美蘇對抗的終結，美國的霸權時代亦已結束。

### 第三節 二元論：遠見抑或錯估？

在正式討論二元論之前，筆者必須指出，本文將伊曼紐爾、華勒斯坦的看法歸類為二元論多少是個冒險的舉動。因為，第一，他並不是位國際政治學家，他也並未企圖建立有關國際政治的理論。第二，本文所稱的“二元論”僅是他對未來走向預測的三個可能方向之一，它並非唯一，亦非必然。但是筆者仍然決定引用此二文并納入討論是因為它有學術上的價值，而且可用以彌補這方面理論之不足。

華勒斯坦的理論大家都耳熟能詳。他以同樣的邏輯來分析並推演未來可能的發展。他認為，1945～1967 年間，美國在世界體系中擁有支配權，這種權力橫跨經濟、政治、軍事及文化各領域。但是，當世界各國開始自戰後的陰影下復甦及發展後，美國的霸權就結束了。現在是一個後霸權的時代，最有力的競爭者厥為日本與西歐。此二個國家——假設西歐整合成功——未來的發展有優勢亦有障礙。就公元 2000 年至 2050 年的中程發展，華指出四個有較大影響力之面向：第一，世界經濟體系內資本向上循環積累的需求有可能促使日本及美國的資本家聯合，從而掌握主要的世界市場。第二，西歐因此被迫採行保護主義，並企圖將中歐、東歐、蘇俄、中東、非洲及印度吸納入其經濟領域中。第三，南北對抗的再生與加劇。第四，一九六〇世界革命運動之再生。經由這四個面向的相互激盪，未來的世界發展將會有三種可能性：第一，日本與美國、中國大陸結盟，以對抗西歐、俄國及東歐之同盟，最後導致二〇五〇年的世界大戰。美國之會與日本同盟是因為要記取荷蘭、及英國失去霸權之歷史教訓，作個謙遜的伙伴同

<sup>⑯</sup> 厄爾·瑞文諾，前引文，第 10 頁。

時分享權力。中國得以參加同盟是因為它可以提供極大的市場，且對其經濟的發展有推動的作用<sup>⑯</sup>。第二，由掌握優勢的世界強權重建新的權力結構，以完成世界體系的重組。第三，世界體系崩潰，進入無政府狀態，直至新秩序緩慢的重建<sup>⑰</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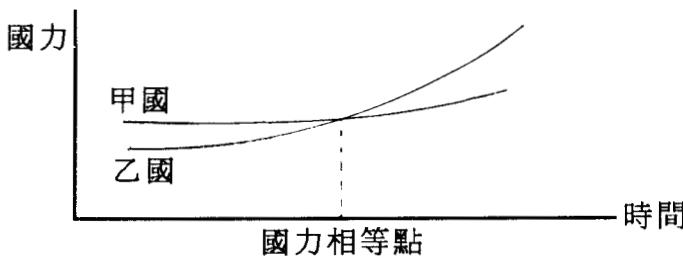
本文所要著重討論的，是第一種可能性。若以圖像來表示，這個結構應如下圖：



此一結構圖有幾點值得注意之處：第一，和多元論及普遍不結盟論一樣，它也預言美國的衰微。但是不同之處是，它大膽地將日本推上了霸權的地位。這當然不是一種十分突兀且全無根據的看法。譬如哈佛大學的傅高義教授（Ezra Vogel）的大作，日本：世界第一強國，（*Japan As Number One*），就已經做出了同樣的肯定。第二，這場未來的二元對抗與甫結束的二元對抗，有一個根本的不同，亦即，在未來的世界中，意識形態的對抗似乎已不復存在。在二個同盟集團中，我們看見分屬過去的民主、共產兩陣營的大國。而在未來，他們跨越原有的意識形態的鴻溝，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進行對抗與爭霸的活動。第三，華勒斯坦這個部份的理論帶有十分明顯的奧干斯基（A.F.K. Organski）的權力移轉理論（power transition）的色彩。奧干斯基的理論大致為：國際秩序有賴霸權國之維持。過去一個國家欲成為霸權可以有同盟及自強兩種途徑。自從工業革命以後，追求工業化遂成為躋身強權的不二法門。若有二強國同時開始現代化，且二國之起初國力及後來之發展速率皆不相等，則至一段時間後，會出現趕上而致二國國力相當的情形。這個時候，奧干斯基指出，就是爆發大國爭霸戰的時刻，而戰爭的結果也就決定了未來的國際霸主。他的理論亦可以一簡圖表示：

<sup>⑯</sup>這種發展的可能性係以華勒斯坦在聯合報之文為底，再以柯志明文（第102～103頁）中之觀點加以補足而成。

<sup>⑰</sup>華勒斯坦，聯合報，1988、0101特刊。



奧干斯基復指出，權力移轉不是一定要靠戰爭來決定，若被超越的甲國能心平氣和的接受、且新興的乙國亦能適度尊重原來的霸主，則霸權的和平移轉是有可能。而且原來的霸主若作一謙遜的伙伴亦可與新霸主維持共享權力的地位。例如第一次及第二次大戰後的英國與美國即是如此<sup>②0</sup>。

很顯然地，華勒斯坦的理論中洋溢著奧干斯基的觀點：爭霸、二元競爭、權力移轉、權力的經濟基礎、爭霸戰、乃至退居謙遜的伙伴以求保有部份權力等等皆是。不過，二者之相似性並不因此就減低了華勒斯坦理論的價值。首先，他將同盟的觀念重新引入分析中，這是對奧干斯基的重大修正。其次，華勒斯坦是以豐富的素材及廣博的歷史眼光而推衍出他的理論，對整個社會科學的發展都作出了很大的貢獻。至於他所沒想的二元世界是否會成為事實，恐怕還要取決於華所提及的四個面向如何交互影響了。

#### 第四節 一元論：美國是否衰微？

前面討論的多元論、普徧不結盟論及二元論都有一個共同點：亦即美國的國力如果不是絕對地衰落則至少是因他國興起後而相對的衰落。這是一元論者與其他各派根本不同之處。一元論者，尤其是杭丁頓教授，不但否定美國衰微的說法，反而認為美國正在復興之中；它不但目前居於世界領先的地位，到下個世紀還是如此。

杭丁頓的論點起於對美國衰微論的反駁。據他的研究，衰微論提出三個基本觀點。一，和其他的市場經濟國比較，美國的經濟正在衰退。二，

<sup>②0</sup>A.F.K.Organsksi, *World Politics*, ( New York : Alfred A. Knopf,1960 ), chapter 12, "The Power Transition", pp.299 ~ 338, Also see A.F.K Organski & Jack Kugler, *The War Ledger*, ( Chicago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 Chapter 1, "Causes, Beginnings & Predictions : The Power Transition, pp.13 ~ 63.

因此，美國的國力亦在衰退，三，美國衰退的主因，來自軍事開支過高，或謂“帝國實力過度伸張”，為了支持這些觀點，他們提出三組證據。一，美國的貿易及財政赤字正在日益惡化，二，在全球經濟力量佔有率及主要經濟領域的成長率上，美國正在衰退，三，美國存在著嚴重的制度缺陷，如研究發展、中小學教育及儲蓄與投資的模式<sup>②</sup>。

杭丁頓逐項提出反駁。他同意近年來美國在國際貿易及財政上都出現赤字。但是赤字的主因，在他看來並不是來自生產力或制度上的缺失。赤字，他認為，主要來自雷根的錯誤政策。因此，當雷根及布希開始調整政策時，赤字的問題即已逐步好轉。

第二，美國佔世界經濟比重的下降。這種看法，杭丁頓以為，就1945年至1960年代末期而言，是正確的，但是這種現象恐怕也是正常的。因為美國原來所佔的高比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經濟殘破的後果。自從1960年代末期以來的二十年中，在世界生產毛額、世界總出口額、七大經濟高峯會議國出口總額及世界技術密集產品出口總額的項目中，美國所佔的比例均大體穩定地維持在百分之二十二至二十五之間。而且，就經濟成長率而言，美國在1983—1987年間與日本相當而超過歐洲經濟共同體。因此，要說美國經濟表現相對下降，是證據不足的。

第三，制度上的缺陷，如低儲蓄率和低投資率。杭丁頓基本上倒同意衰微論的看法。

第四，美國因軍費支出太高而影響到經濟的發展。杭丁頓將美、俄、日三國的消費、國防及投資的比例作了一個比較：

	消費/GNP	國防支出/GNP	投資/GNP
美國	78/100	7/100	17/100
日本	67/100	1/100	30/100
蘇俄	56/100	18/100	26/100

杭丁頓言簡意賅地指出三者間的差別：美國消費、日本投資、蘇聯武裝。因此，與其說美國的經濟發展被過高的國防支出所拖累倒不如說是受制於美國國民普遍的高消費主義來得更恰當<sup>②</sup>。

在反駁了衰微論後，杭丁頓進而說明，美國之所以不易衰落其主要原因在於：就內部而言，美國是一個在政治、經濟及社會各方面都比較開放的體系。開放意味著反獨佔及鼓勵競爭，競爭、社會流動及外來移民，他

<sup>②</sup> 杭丁頓、前引文、第422～424頁。

<sup>③</sup> 杭丁頓、前引文、第424～436頁。

認為，構成美國復興的動力<sup>②3</sup>。就外部而言，美國亦享有三個條件的優勢。第一，與其他國家相比，美國的國力具有獨特的多層面性，亦即，美國的國力來源較為多元，不像許多國家較單一，如蘇聯依恃軍力，沙烏地阿拉伯仰賴石油、日本則依靠產業及金融資源。由於美國國力的多元化，故單一領域的挫折無法戲劇性地削弱美國的實力。第二，美國在世界政治上的結構地位也強化其影響力。在地理上，它遠離各主要衝突區；在歷史上，它的海外帝國主義的色彩較淡；在經濟及政治哲學上反對中央集權，對他國較不構成威脅；參與多邊聯盟體系；具有強烈的向全球組織認同的意識。第三，美國具有有强大吸引力的意識形態：政治民主及經濟自由。就此而論，蘇聯的思想體系已經瓦解，日本由於文化及社會的限制恐怕無法發展出一套不同的意識形態；唯一有可能的，是統一的歐洲<sup>②4</sup>。

最後，杭丁頓表示，衰微論雖然不正確，但是它的出現可以令美國人自我警惕，從而減低了美國真正步上衰微的可能性。因此，提出衰微論反而促使美國更加健康<sup>②5</sup>。

杭丁頓此文雖然充滿了論爭的色彩，但是他的看法並不如表面上看來那麼與人針鋒相對。事實上，他的不少重要觀點和其他的人想法仍有交集之處。首先，他雖然強烈地認為美國目前是唯一的強國而且下個世紀仍是如此。但是，他亦看見其他國家興起的可能性。尤其歐洲，他指出，在投資、消費及建軍三個部份的比例比美國、日本、蘇俄都更均衡，而且亦有可能發展出一套足以與美國抗衡的意識形態，所以具有很大的潛力成為舉足輕重的強權<sup>②6</sup>。

他對歐洲的評價在尼克森、甘迺迪、及華勒斯坦的觀點中都可以找到強烈的回響。易言之，對於歐洲未來的發展多數學者抱持較肯定的看法。當然，人們對於歐洲實力的看法或有不同，有人強調其現有的及未來的經濟力量；有人注意到西歐的整體軍事力量。但是，包括杭丁頓在內，所有看好歐洲的學者都接受一項假設：西歐各國未來會統一成為一個單一的國家。

其次，在評價歐洲時，杭丁頓提出了一項獨特的看法。他認為，能提出一套吸引人的意識形態變成作為超強的必需條件。這個看法，與菲夫對

<sup>②3</sup> 杭丁頓、同上、第436～439頁。

<sup>②4</sup> 杭丁頓、前引文、第439～443頁。

<sup>②5</sup> 杭丁頓、前引文、第444～447頁。

<sup>②6</sup> 同上、第443頁。

超強（super-power）的定義相似。但是菲夫僅僅提及此一觀點，並未作更廣泛的申論<sup>②7</sup>。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看法多少回應了杭丁頓的觀點。當學界在熱烈辯論美俄對抗終結、二元時代消逝時，福山自一個不同的角度參與了這場盛會。他認為，我們目前看到的，不僅是美俄二元對抗時代的結束，而是人類歷史的結束。所謂歷史的結束指的是：人類意識形態的演進過程已經達到其終結點，西方自十九世紀後出現的自由主義民主（liberal democracy）思潮，在歷經絕對主義、法西斯主義及共產主義的挑戰後，終於克服一切，佔據了人類政治思想的王座<sup>②8</sup>。

很明顯地，福山的看法帶有濃厚的黑格爾的色彩，而且帶有絕對性。杭丁頓的看法雖然不如福山般哲學及絕對，但亦認為美國代表的經濟自由、政治民主的思潮不僅為其國力之來源，也是其他國家短期內無法向美國地位挑戰的重要保證。

另外一位主張一元論者為查爾斯·克洛泰默。他的看法與杭丁頓可謂是異曲同工。第一，克洛泰默認為，在共黨集團瓦解及波斯灣戰爭之後，這個世界並未成為一般人所說的多元世界，而是一個一元的世界。雄踞在這個世界結構上層的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工業國家，第二，美國將來如果衰落，其原因絕不是如某些人所說的海外擴張活動，而是內部的原因。第三，現在世界各地出現了一些“武器國”（weapon states），它們熱烈地建立本身的軍備，有的甚至已經或即將擁有核武器或長程飛彈。這些國家，包括伊拉克、北韓、利比亞等國，對明日世界帶來了安全上的威脅。第四，美國能否保持其領導的地位及世界秩序，端賴其是否戰勝國內的孤立主義並維持適度的對外干預行為<sup>②9</sup>。

由此可見，克洛泰默的觀點與杭丁頓頗為近似。二者唯一的差別或許在於：杭丁頓對於美國未來的看法雖然相當樂觀，不過其預測仍是以實然的分析居多。反觀克洛泰默的立場，則在實然面的樂觀之外，還加上了濃厚的應然分析，亦即，他強烈主張美國應該採取一系列措施去維持這種對它有利的國際一元體系<sup>②10</sup>。

<sup>②7</sup>威廉·菲夫、前引文、第34頁。

<sup>②8</sup>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pp.3~18.

<sup>②9</sup>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70 : 1, 1991) pp.23~33.

<sup>②10</sup>同上註, pp.31~33.

## 第五節 結論

在對各學派的理論作了分析之後，我們關切的核心問題，未來世界的政治結構究竟是幾元，恐怕還未能獲致一個簡單、明確的答案。我們現在似乎有必要重述他們爭執的關鍵點：

第一，蘇聯及共產集團作為國際政治的一個“元”而言，是否已經瓦解。這學派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分歧似乎比較小。不論明示或默示，人們大都接受這個看法。唯一的差別或許是，較早期的理論家還設想蘇聯在未來仍會維持相當的國力及地位，而愈是晚近出現的論著對蘇聯未來的看法就愈不樂觀。

第二，其他國家是否將會興起？除了一元論者外，其他學派都持肯定的態度，他們的差別僅在於：那些國家會興起。最為學者們所看好的國家不外日本、西歐及中國。就日本而言，它目前的成就及未來的潛力已經為大多數人肯定，它在未來世界中佔有一定的地位已是不容置疑，爭執的焦點僅在它的“排名”究竟可至多高。普遍不結盟論者及多元論者都將其列入第一級的國家，二元論的華勒斯坦則大膽地將日本推至頂峯。

就西歐而言，它的經濟、政治及軍事的潛力亦為多數人肯定。唯一的懷疑就是：西歐各國是否能夠成功地統合成一個單一的國家。多元論、二元論以及一元論者似乎都毫不懷疑其必然性。但是主張普遍不結盟論的瑞文諾卻獨排衆議，認為西歐各國的整合最多只能完成經濟層面，政治層面的整合是不可能達成的。若再輔以杭丁頓的觀點，則歐洲未來要達到超強的地位，除了整合之外，尚須發展出一套能與美國相抗衡的意識形態。

第三個被看好的國家是中國。人們對它的看法，一言以蔽之，就是“不敢小看”，除了一元論者隻字未提外，其餘的多元論、二元論及普遍不結盟論大率認為中國大陸目前雖算不得強國，但是在未來的世界中，它必然佔有一席之地。需要進一步闡明的是：這個中國是否仍由共產黨來統治。尼克森抱持的看法是肯定的，甘迺迪雖亦同意，但是他亦指出鄧小平的改革具有非社會主義的性質及效果，瑞文諾及華勒斯坦則未觸及。我們必須指出，以上作品多數寫成於一九八九年以前。經過「六四」屠殺後，中共在國際社會中的合法性已經大幅降低。當東歐諸國及蘇聯變色時，人們問的問題不是中共是否會垮台，而是問何時會垮。因此，沒有共產黨的中國會受到人們如何評價恐怕不是現在可以預言的。

第三，前述問題的另一面就是：美國是否衰微？這個問題討論已多，此處不再贅述，而且它與最後一個問題息息相關。

第四，何謂“元”？經過冗長的討論後，我們發現，人們對未來世界結構的分歧看法是由於對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尚無滿意的答案。這個問題就是：何謂“元”？由於學界對於“元”並無明確統一的定義，因此面對下列問題時，如俄國雖已衰微，但其軍力依然大，它是否仍是一“元”？日本的經濟實力高居世界前二名，但是其軍力有限，是否可算是“元”？中共國力明顯不及他國，但是它是大國，又有核武器，是否也是一“元”？最後，如果美國國力確實在衰落，那麼它要衰落到什麼程度，這個世界才不再是“一元體系”？學者們的看法就會顯得分歧甚至混亂了。

在國際政治學界中，我們注意到多數學者在使用“元”的概念時，都只是模糊的指涉國際政治中的主要國家（major state）的數目。例如著名的理論家肯尼士·華爾茲（Kenneth Waltz）即作如此界定<sup>③1</sup>，而布魯士·洛塞特（Bruce Russett）和哈維·司塔（Harvey Stan）卻認為所謂“元”，係指涉或者是一個單一的主要國家（或民族國家），或者是由一個或多個強國及較小的國家所組成的一個緊密的同盟<sup>③2</sup>。

這些定義其實都還不夠精確。由於這不是本文的寫作目的，是故此處只能提出界定“元”的幾個重點。第一，它必須包含一國的國力，不論是經濟的、軍事的，抑或綜合的。第二，它必須包含一國願意運用其實力於其國界外的意志。第三，它必須為其他國家所承認或接受。

我們相信在學界對“元”的定義作了明確而統一的界定後，即使我們在事前無法斷言未來世界的面貌——因為人的意志及努力往往是改變世界的有力因素——至少我們對那些國家有資格或有可能成為世界性強權會比現在有更大的把握。

---

<sup>③1</sup>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Boston : Addison – Wesley, 1979 )

<sup>③2</sup> Bruce Russett & Harvey Stan, World Politics : The Menu for Choice, ( San Francisco : W.H. Freeman & Co, 1981 ) pp.99~101.